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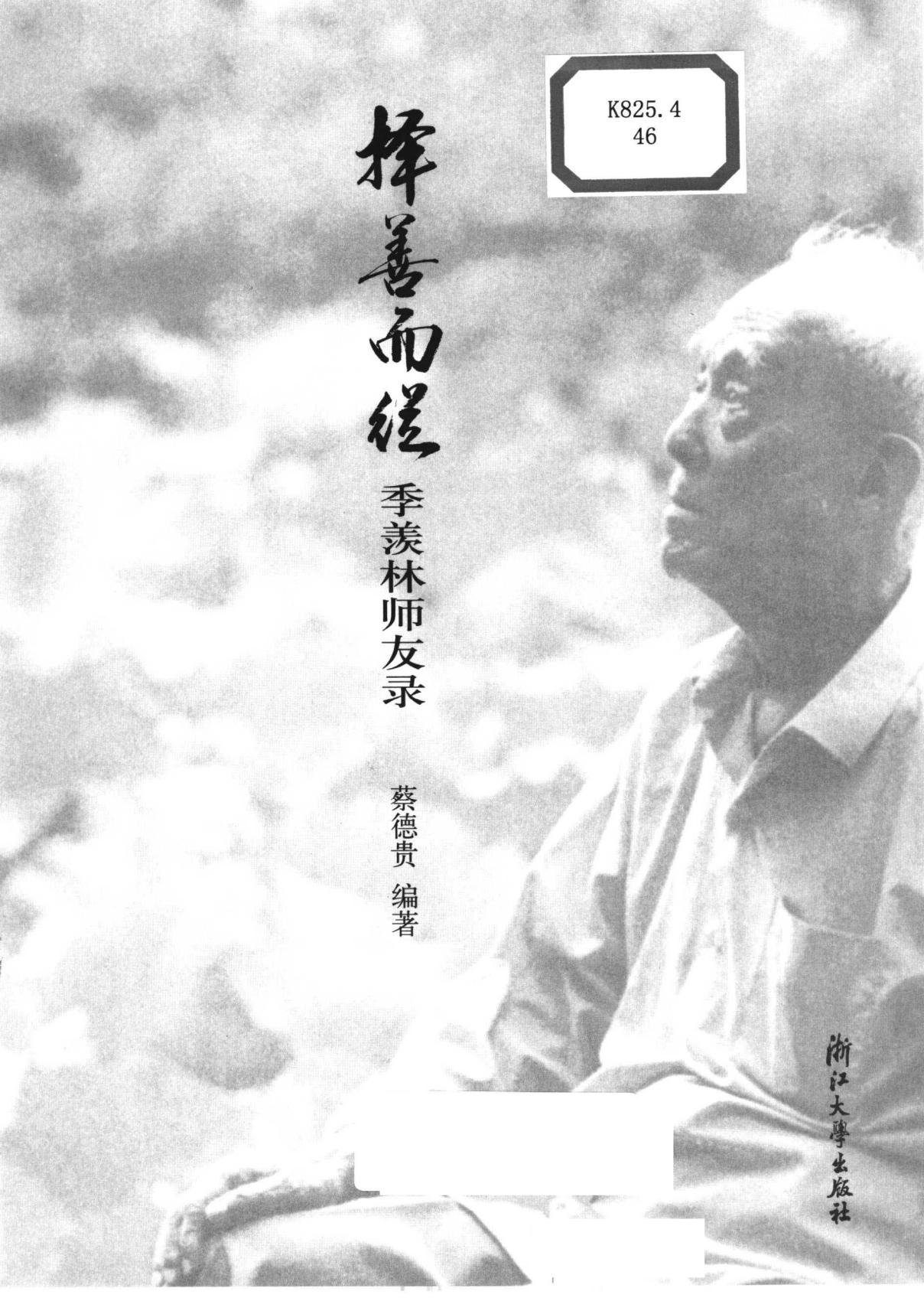
择善而往

季羨林師友錄

蔡德貴編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K825.4
46

择善而从

季羨林师友录

蔡德貴 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择善而从：季羨林师友录 / 蔡德贵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308-04172-7

I . 择... II . 蔡... III . 季羨林 - 生平事迹
IV .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814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黄宝忠 吴松女
封面设计 张 磊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0 千字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172-7/K·134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楔子	(1)
启蒙的马老师和叔父季嗣诚	(6)
爱国者鞠思敏	(15)
“桐城派”王崑玉	(23)
前清状元王寿彭	(29)
“真正念书”的祁蕴璞和尤桐等老师	(35)
浪漫的革命者胡也频	(42)
业师董秋芳	(46)
夏莱蒂和张默生老师	(52)
一生坎坷的董每戡	(55)
五四运动参加者何思源	(58)
感伤主义者吴组缃	(64)
诗人兼学者林庚	(73)
“屡遭批判的”批评家李长之	(76)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84)
西洋文学系教授们和达官兼名士叶公超	(94)
性格乖戾的吴宓	(105)
大胡子哲学家冯友兰	(114)

一

师友錄

名流



女作家冰心	(118)
美学家朱光潜	(121)
逻辑学家金岳霖	(125)
“抬杠”会长郑振铎	(128)
革命家和政治家胡乔木	(133)
风云人物宋还吾	(139)
哲学家和外交家乔冠华	(146)
“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150)
祖父般的西克教授	(157)
多才多艺的布劳恩教授	(162)
房东欧朴尔夫妇	(165)
永远难忘的伊姆加德	(168)
知心朋友章用	(171)
职业翻译家田德望	(176)
风格独特的沈从文	(179)
朴实无华的李广田	(184)
“济南四君子”之一许衍梁	(187)
人民艺术家老舍	(190)



“猫友”梁实秋	(193)
最要好的朋友臧克家	(196)
北大校长胡适	(204)
“大炮”傅斯年	(215)
难以超越的汤用彤	(223)
民俗学之父钟敬文	(230)
性格倔强的金克木	(233)
穆斯林学者马坚	(237)
藏文专家于道泉	(241)
最有才华的诗人冯至	(246)
国学泰斗饶宗颐	(248)
忠实助手李铮	(253)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李玉洁	(258)
附录：厚重与平易——从“表”到“里”看季羡林先生	(265)
后记	(281)

三



楔 子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学品人品是国内外学人所称道的。他从一个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个学界泰斗的经历，给无数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既有学识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

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饶宗颐先生称他为“博大长者”。他学富五车，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其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历史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有传世之作；所出版的散文则平实质朴，充满了真情实感，拥有众多读者，一版再版。多年来季羡林先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也成为年轻学人热爱的老一辈学者。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杰出的成就？是哪些因素造就了季羡林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内在因素，外在的环境在他成才的过程中是否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轻人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受到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一位学术大师的成长更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师友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在泰斗一级的学术大师的身上也是适用的。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都是“一些素心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当然没有酒肉朋友。陶渊明诗曰：“闻多素心人，乐于数晨夕”，正是他追求的。他自谦地说自己朋友不多，其实他有无数的朋友，每天去拜



师友录

季 羨 林

二

访他的人要排队、预约。在季羨林的一生中,对他起过关键和帮助作用的师友也有不少。季羨林先生本人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长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季羨林指出的这六位恩师是陈寅恪先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西克先生、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事实上,对季羨林起过重大影响的恩师远不止这六位。在他的成才之路上,有哪些人对他产生过影响,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作者在写作《季羨林传》的时候,已经涉及到他的一些师友对他成才的影响。但是那是一部涉及到许多学术问题的著作,无法挖掘深层的背景。所以以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师友为主线,写出一部书,这对当代青年学子的成才是有帮助的。

季羨林先生是山东大学校友,他自己说真正开始用功,是在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因此,季羨林先生不仅是北大的骄傲,是清华的骄傲,也是山大的骄傲。在这些学校里,季羨林的老师给予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而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又受到德国一些老师的影响。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恩师的培养和影响,造就了季羨林,成就了一位学术大师。在季羨林的成才之路上,师友的作用大矣。

《周敦颐集·通书·师友上》有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师友下》有言:“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柳宗元更认为所谓师生关系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将师生关系转变为师友关系(《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宋代妙喜普觉、竹庵士珪二禅师于江西云门寺所辑录的《禅林宝训》曰:“父母养汝身,师友成汝志。”一个人是否博学,与师友的交往有很大的关系,朱熹在《中庸或问》一书中对此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

钱塘瞿存斋公(瞿佑)著《归田诗话》三卷,述其师友之言论,宦游四方之习

闻,而有关于诗道者,他自己认为时加披览,如见师友,聆其训诲之勤,而受其劝勉之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推出蒋英豪编著的《黄遵宪师友记》,是一本对黄遵宪研究者以及近代史、近代文学研究者都实用、称便的人物工具书。该书以“师友”为名,有助于了解黄遵宪的社会关系以及他是怎样建立起这些关系的,由此而确定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及影响。这样的书就像黄遵宪的“私人名片盒”,从每张名片登录的资料中不难知道其主人的出身、来历及其与黄遵宪的关系。这些书都对师友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一脉相承的。

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说过,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之“三纲六纪”,其中第五、六纪即是师长、朋友。季羡林非常欣赏陈寅恪的一句诗,“风义平生师友间”。季羡林亦师亦友的熟人不在少数,共有几百人吧。这些师友范围太广,有些也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此在这些师友中必须进行筛选。本书筛选出涉及到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师友40余人,其中重要的有鞠思敏、王祝晨、胡也频、董每戡、董秋芳、王寿彭、尤桐、王崑玉、李长之、许衍梁、何思源、吴组缃、林庚、胡乔木、李广田、乔冠华、朱光潜、陈寅恪、郑振铎、吴宓、冯友兰、胡适、臧克家、沈从文、瓦尔德施米特、西克、西克灵、布劳恩、欧朴尔、伊姆加德、汤用彤、老舍、梁实秋、冯至、于道泉、马坚、金克木、李铮、李玉洁、饶宗颐……在季羡林看来,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语,无不蕴含着无量启迪;而对后进者,则是无量的财富。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

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大师是和大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大师成才的环境中,对大师的大爱的作用更值得注意。众所周知,季羡林小时候是穷人家的子弟,高中以前又非常不安分,打架斗殴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上了山东大学附属高中以后,由于受到恩师王崑玉的激励(王崑玉在给季羡林上第一次作文课时,布置的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他给季羡林写的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从此学习成绩好起来,连续四个学期得了第一名,因此作为书法大家的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同时兼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给他写了一幅扇面和一副对联。从此他的上进心更强了,到高中毕业时,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就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学者。

有一个时期我们无情地批判了超阶级的爱,原因是一个简单的推理,“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从个体的行为而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爱确实不是普遍的,但是也绝对不是绝无仅有的。而就社会整体而言,人类之爱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师友錄

李清志

四

实存在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才造就和培养出一些学术大师。爱可以开启童蒙，爱可以驯化顽冥，爱能够化愚昧为聪明，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由此，有学者主张“学校应该充满大爱”。2002年9月17日《文汇报》刊登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在英国当大学校长的杨福家的文章说，普林斯顿大学是2001年名列美国榜首的世界顶尖大学（哈佛名列第二），她不仅有恬静的校园和优美的大楼，更充满着大师和“大爱”：她只有6500名学生，不算大，又没有医学院，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她却培养了两位美国总统，又在诺贝尔奖百年的历史中培养出了24位获奖者。

学校有这种“大爱”，就会培养出大师。

爱有多种多样，有孔子对学生的那种爱，有王寿彭对季羨林的那种爱，有熊庆来对华罗庚的那种爱，有闻一多对臧克家的那种爱……

孔子对学生是爱护备至的，超过了自己的孩子。学生的身份他不管，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于身“居陋巷”，靠“一簞食、一瓢饮”维持生活的颜渊，他更是体贴入微，认为对于一般人“不堪其忧”的贫困生活，颜渊居然能够“不改其乐”，大加称赞：“贤哉回也！”对学生的疾病，他非常关心，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论语·雍也》）。由于他爱生如子，学生也尊师如父。正是有了这种爱心，孔子的三千弟子中竟然出现了贤人七十二个，名垂青史。孔子培养学生的成功来自对学生的爱心。孔子对人才的爱护得到孟子的继承，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人生的三大乐之一，这种对人才的爱是一种“大爱”。

华罗庚的成名也与熊庆来对他的大爱有直接联系。华罗庚从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升高中，考进黄炎培在上海办的中等职业学校。这个学校费用较少，但是每学期膳费仍要50块现大洋。他坚持了一年半，再也缴纳不起膳费，只得辍学了。金坛中学把华罗庚请回来当一名庶务员。由于他数学才能出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一下子被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中，熊庆来不计较他的出身，不拘一格，聘其为清华大学教师并力荐为助教。校委会不肯破例聘用没有学历的人，熊庆来说：“你们不聘华罗庚，我就走。”校长梅贻琦感动地说：“规矩是人定的，也可由人改。吾人均知曹魏九品中正之制，任人唯贤，古今至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诸委员考虑。”这样，华罗庚就成为清华的正式助教。熊庆来这一聘一荐，为中国数学界造就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钱钟书的成才得益于罗家伦的大爱。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数学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因为他英文、国文成绩特优，英文还是满分，而数学又极差，于是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进了清华，钱钟书开创了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考试成绩第一。他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为名满清华的才子。

1930年吴晗报考清华历史系，数学成绩是零分，但他中文和英文成绩奇高，竟是两个满分。罗家伦校长仍然大笔一挥，将他破格录取。这一挥，挥出了一个历史学家。

臧克家成为诗人与闻一多的大爱直接相关。1930年他报考山东青岛大学时，数学零分，作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常情况下他铁定不会被录取。但他天生走运，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闻一多先生。三句杂感让闻先生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藏的才气，语文成绩被打了100分，破例被录取。臧克家不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发表了一首又一首新诗，并于1933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诗集《烙印》。没有闻一多，就没有“臧克家式”的诗人。

新加坡文学巨匠陈瑞献的成名也是大爱的结果。陈瑞献年少时代是桀骜不驯的脱缰野马，被有些老师视为不可雕的朽木——课堂神游、考试作弊、成绩零蛋，后遇上良师，虽历经善导，但还是把打架当运动，仍然是学校模范生的反面教材。就是这样一个冥顽不灵的陈瑞献，经过两位良师的循循善诱，最终进入自省自觉、奋发图强之途，力争上游，终以全校最高分数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20世纪60年代收生严谨的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为“未来的文艺之旅准备好了行囊”。大爱促使了陈瑞献的人生转折点形成。

至此我们可以说有很多大师的出现正是大爱的结果。为了更多地培养出大师，学校里确实应该充满大爱，应该给学生以大爱。季羡林这位学术大师的出现，无疑是他的老师对他大爱的结果。

有关季羡林师友的著作至今还未曾出版过，季羡林先生本人的回忆文章虽也涉及到一些，但大多是以单篇的形式出现的。拙著《季羡林传》也只是在涉及到学术方面时提到了一些人。而本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季羨林

启蒙的马老师 和叔父季嗣诚

一个人的成才往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许多因素中,有的是必然因素,有的是偶然因素。只有不失时机地抓住各种有利的因素,才能成才。

出生在山东的思想家孟子,小时候是非常淘气的。他特别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不利的因素的影响。俗话说“学好不易,学坏容易”,但是孟母三迁改变了孟子学坏的倾向。

季羨林的成才则是叔父季嗣诚给予了第一个机会。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以名行。乳名叫喜子。他于辛亥(猪)年的闰六月初八日,即1911年8月2日出生,后来因为阴阳历换算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笔误,写成了8月6日,之后就以8月6日为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错,使自己在世界上少活了四天。

季羨林的家乡在山东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官庄,这是当时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季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均为农民。叔父季嗣诚。祖父母早亡,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季羨林的父亲行大(在家族的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父亲和叔父两个人,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他们大概很难有吃饱过饭的时候,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看来乡下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有饿死。兄弟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外面的大城市里去找一条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为生活费尽了心思,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了不知多少苦力,受了不知多少煎熬,但是只有叔父在济南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立定了脚跟,像是石头缝里的小草,竭尽全力挣扎着。于是父亲只有回家务农,叔父在济南挣钱,希望早晚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至少能让人另眼相看,也算为祖辈和自己争一口气。

季羡林出生之后，家庭状况越来越糟。吃的东西越来越差，红高粱面饼子是家常便饭。穷得买不起盐，只有在盐碱地上把土扫起来，放到锅里煮一煮，煮出来一些咸水，用来腌咸菜。这样的咸菜往往是又咸又涩，就着高粱面饼子，那才叫难以以下咽。要是能吃到一点玉米面饼子，那就是稀见的珍品，季羡林有时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有时候为了吃到一顿玉米面饼子，季羡林还真得费点脑筋。过年时，吃一次白面馒头或黍米做出的黄色年糕，他简直眉飞色舞起来，以为是吃到了龙肝凤髓。

小时候，季羡林在老家有两个要好的小朋友，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巴小。杨狗是1910年出生，这年是狗年，农村人家为了让孩子好养，便给孩子起一些猪啊狗啊的名字。哑巴小简直就是没有名字，因为是哑巴的儿子，人们就叫他哑巴小了。

三个孩子都是穷人家出身，谁也不嫌弃谁，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总是很痛快。夏天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在村南头一户人家的屋后有一个大水坑，他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一头扎进去，凫水摸虾，或者上树抓知了。他们不见不散，几乎天天泡在一起。

杨狗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官庄，一辈子都是农民。他一直活到上个世纪80年代。而哑巴小后来居然去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硬功夫，能蹿房越脊，飞檐走壁。他劫富济贫，做了一阵子英雄。有一次作案时，被官府捉住。在寒冬腊月里，他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捆起来，再泼上凉水，吊到大梁上，冻一个晚上，居然还活了下来。他被村里人视为英雄，因为他杀富济贫，而且从来不偷本村人家的东西。

这个村子，住的大多是穷人。邻居家有认得个字的，就算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了。6岁以前，季羡林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些什么，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甚至连《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教过。马老师可以算是一字之师，或是几字之师。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季羡林可以称得上老师的第一个人。

6岁的孩子，在村子里能干些什么呢？季羡林常干的事情是：黄昏以后，到苇子坑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夜晚和小伙伴到村子外去捉知了，在老柳树下，生起一堆篝火，然后拼命地摇动柳树，使得树上的知了纷纷飞落到篝火里，这让他们乐得忘记了回家。也有时候，他会跑到水坑里去玩水，光着屁股在水里玩得痛快，身上沾满了泥水也不在乎。

就在这一年，季羡林在济南的婶母回到了官庄。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五四运

季羡林

八

动，消息传到济南，济南还不知道五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就叫“闹五大洲”。作为响应，一时间，济南也闹开了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清平老家的父亲怕叔父出事，就赶着一辆马车，进了济南，想把叔父一家全接回清平避难。到了济南，叔父正在黄河河务局上班，脱不开身。于是，父亲也不再迟疑，把婶母和秋妹接到了清平。季羡林的婶母看到的，就是浑身泥猴一般脏兮兮的侄子，上树爬墙，追逐嬉闹。婶母便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说这个孩子在村子里这样下去，难以成才，永远也不会有出息，干脆让他到济南去吧，或许还能成一块料。咱们老季家就他一个男孩，他是季家唯一的希望，只有到济南才有希望。父亲当即决定，等济南情况稳定下来，就把孩子送到济南。

就这样，在1919年的冬天，季羡林被扶上一头驴子，赶了两天的路，和父亲一起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

到了济南，季羡林这才发现自己离开母亲的痛苦。在到济南的头天晚上，季羡林第一次不在母亲的怀抱里睡觉，孤零零一人躺在一张小床上。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哭了一夜。他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济南，让他离开母亲。他知道叔父对自己的期望很高，会对自己很好，但自己总感到寄人篱下。这种感觉越到后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与叔父的亲生女儿秋妹比较的时候，他有一种受虐待的滋味。

其实，他也知道叔父的不易。叔父本来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困苦，终于立定了脚跟，在黄河河务局谋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总算无衣食之忧，比起在官庄的父母来，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因此，对于叔父，季羡林一生都是非常敬重和佩服的。在季羡林眼里，叔父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却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着自学，获得了不少文化知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够写一手好字，也能够刻图章。叔父还读了不少古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书籍，他很感兴趣，还经常正襟危坐地读一些《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籍。他写了不少古体诗文，有一首七绝是写春天景色的，季羡林至今还记得：

杨花流尽菜花香，
弱柳扶疏傍寒塘。
蛙鼓声声向人语，

此间即是避秦乡。

可以见出叔父的文学修养和哲学涵养都是很高的，他自然想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好能够超越他，为祖宗争光。因此，叔父下决心把季羨林培养成有出息的人，他要让季羨林上学。

从那时起，季羨林才算开始正式上学。先在叔父的朋友任晓麓办的私塾里念了一段时间，念一些《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的读物。私塾先生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每天入学，总是先给孔子的牌位行礼，然后再念“赵钱孙李”。念了大约一年私塾，先生见他野性不改，顽劣成习，怕败坏了私塾的校风，再也不愿意教他了。无奈，叔父把季羨林送到一所新式的小学——设在济南南城根的济南第一师范附小（现在的黑虎泉西路小学），与后来的批评家李长之是同班同学。这所学校坐落在升官街上，因为街上全是做棺材的，为了避讳，才叫了这么个堂皇的名字。小学校长由济南第一师范校长王大牛（真名叫王士栋，号祝晨）兼任。王大牛是新派人物，在山东得风气之先。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和山东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响应提倡新文化的号召，在学校里推行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济南首先采用白话文教科书。学生不再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而是念“人、口、手、足、刀、尺”了。

在小学生眼里，校长是个大人物，轻易是见不到面的。对老师，见了面，学生老远地就要鞠躬。一般学生都害怕老师，因为老师对学生很严厉，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体罚，用手拧耳朵、用戒尺打手心，是老师最常用的方式。学生自然是逆来顺受。

季羨林在这里照样野性不改。学校规定写毛笔字，每到上课的时候，他便和孩子们互相往脸上涂墨汁。有一次刚回到家，婶母见了就是一顿训斥，责问他为什么跟人家打架？季羨林还不明白婶母怎么知道自己打架的，问秋妹，秋妹大笑，让他自己照镜子看看。这一照，季羨林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在家里，婶母有时候也让兄妹写大仿，他就让秋妹往自己的脸上画胡须，闹着玩；他也往秋妹脸上画上一些图案。那练毛笔字的劳什子早就抛到一边去了。

在小学国文课本里有一篇《阿拉伯的骆驼》的课文，是说在一个冬天里，主人在沙漠里搭了帐篷，骆驼站在外边感到太冷，于是与主人商量能不能把头伸进帐篷里暖和暖和，主人答应了。可是过了一会，骆驼又商量说让它把身子伸进去吧，主人又答应了。最后骆驼全身都进去了，而主人却被挤出帐篷，冻死了。不经意间被叔父发现了这个课本。叔父非常生气，觉得很荒唐。于是让季羨林转学了。

师友錄

季羡林

因为在这所小学呆的时间短,只有一年多,对老师的印象都不深。季羡林只记得有一次上手工课,手工老师教学生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头盔。老师知道学生不会写这个“盔”字,就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上,写完了,回头看一下学生。老师戴着近视眼镜的一副得意的脸,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里,季羡林的学习积极性几乎没有的,他的兴趣仍在玩上。他滚过铁圈,在大街上,用一个小铁钩,推着铁圈到处跑着玩。然后还做过几次卖花生米的小买卖,赚了几个铜板。真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学生!

季羡林离开了济南第一师范附小,转入新育小学,同时转学的还有季羡林的一个表兄孙襄城。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受老师垂青,让他从高级小学一年级开始念起。而那个表兄不认得这个“骡”字,被安排到小学三年级。

新育小学不算小,但是校园里有点乡村味。用一个木架子支撑着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书四个大字:循规蹈矩。对学校的老师,季羡林几乎没有什好印象。不管是沙着嗓子念古文的国文老师,还是教数学的老师,大多板着脸,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吓人。这里的课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上课的时候,他和其他顽皮的孩子一样,在课桌上用小刀刻花,在书本上画小人头。课后,他自由了,约了几个小朋友飞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池子边上,去捉蝴蝶,或者捡小石头子打水漂玩。幼小的心灵倾注到蝴蝶的彩色翅膀和小石头子的螺旋似的花纹上了,从中他获得了快乐。

唯有季羡林的班主任,一个姓李的老师,40多岁,在学生的眼里显得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也不训斥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他教的课很多,连劳动也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大圆池子旁边去种菜,芸豆、辣椒、茄子等都种上了,就是没有种西红柿,因为那时济南还没有西红柿。一直到现在,季羡林还把去种菜的那一天当作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李老师还开始教季羡林英语,他教学生认字母,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粗。这个比喻,季羡林直到现在还记得。

国文课的教科书上有一些寓言故事,季羡林觉得蛮有趣味。有一篇写乞丐的文章,说一个乞丐要满了一罐子残羹剩饭,便对着罐子幻想起来:怎么样卖掉这些残羹剩饭,怎么样用赚来的钱买成鸡,鸡又怎么样下蛋,鸡蛋又怎么样孵出小鸡,小鸡又换成了马牛羊,终于成了一个大富翁,娶了太太,生了孩子。乞丐越想

越高兴，不禁手舞足蹈。在狂欢之余，猛然一抬脚，把这罐子扔个粉碎。到此幻想结束。这样的故事，季羨林当然觉得好玩。类似的故事在吴兴人韦居安的《梅磬诗话》、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和《苏东坡诗注》等书里都有记载。后来季羨林研究了印度文化，才知道这些故事的源头在印度，《嘉言集·和平篇》和《五卷书》的第七个故事即是源头。

在国文课方面，当时季羨林非常害怕写文言作文，好像有语言障碍，而且最难的是不知怎样开头。老师的作文题写到黑板上，季羨林只在作文本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然后就穷了词儿，再也不知道写什么了，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来。有一次，实在憋不出来了，就在不知什么书上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因为句子通顺，老师给表扬了一番。后来季羨林一想起这件事，总感到羞愧不已，下决心再也不剽窃别人的文字，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搬抄过任何人的文字。

而其他老师的课，课堂生活实在乏味，老师又严。孩子们动辄受罚挨打，实在受不了，他们起来造反了。

有一个珠算老师姓孙，眼睛长得突出来，孩子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知了”，济南土语叫“稍迁”。他对孩子特别蛮横，打算盘不准错，规定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孩子们打算盘都是初学，错上十一个八个数，甚至上百个数，是常有的事，因此孩子们都挨过他不少板子。实在忍不下去了，孩子们决定造反，把他架走（即赶走）。他们商定：等他来上课时，大家上去把他的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跑到假山背后的树丛里。他们每人口袋里装上一些树上长出来的黄豆豆，准备用来打孙老师的脑袋。孩子们觉得这样一来，老师会无颜见人，非卷铺盖走人不可。但是等他们要用黄豆豆打老师的时候，才知道结果不妙，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他们坐在那里听课，课桌早就翻回来了。这样一来，老师反而长了气焰，把几个造反的孩子用大竹板打手心，打得那个狠，手心很快肿起来了。季羨林也被叫起来，挨了十几竹板子，他的手立即红肿起来。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忍着热辣辣的疼痛，把口袋里的黄豆豆掏出来扔在地上。

这次造反没有成功。

但是有一次造反却成功了。那是对付一个图画老师，他脾气暴躁，常常伸出手就打人。孩子们团结一致向他示威，他知难而退，辞职不干了。

学校里有趣的地方，是一个设在学校的幽暗角落里的图书室。每天过午下了课，季羨林就一头扎进去，读那些封面很美丽，里面的插图也很鲜艳的儿童读物。